

团结就是力量，统一才能振兴中华

——纪念河南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申志诚

1995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追念革命先烈和前辈的丰功伟绩及中华民族团结奋起御侮，终克强敌的峥嵘战斗岁月，目的在于弘扬民族精神、褒扬中华精英，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首次取得反对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确实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而取得的。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它北接平津冀，西扼晋陕，南邻鄂湘，东进可径取苏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敌我友三方都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河南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

—

“七·七”事变后，由于华北正面战场的溃败，使河南成为华

北抗战的后方，西北的门户，武汉的屏障，南北战场的枢纽，中国抗战的最前线，形势极为严峻。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先后向豫北、豫东和豫南进行了三次大的军事进攻。

第一次是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侵犯豫北。1937年11月初，沿平汉铁路南犯之敌第一军第十四师团前锋抵达豫北。11月4日敌占领我豫北重镇安阳。12月8日敌第一〇八师团由河北侵入豫北，12月15日占领清丰、南乐县城，烧杀抢掠后退回。1938年2月初敌分两路再犯豫北。沿平汉铁路东侧南犯之敌第十四师团2月7日占南乐，8日再陷清丰，9日陷濮阳、内黄，13日占长垣，15日陷封丘。2月8日沿平汉铁路南犯汤阴县境之敌，11日陷汤阴，13日占淇县，16日陷辉县，17日占领新乡。2月17日国民党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奉命炸毁黄河大桥，日军被阻于黄河以北，随调转兵力西犯，2月18日占领修武，20日占领焦作，21日占领博爱，22日占沁阳、陷孟县，25日占济源。到1938年2月底，我豫北大好河山几乎全部沦入敌手。

第二次是1938年5月至6月侵犯豫东。1938年5月19日沿津浦路南犯日军在华中日军配合下占领徐州，然后合力沿陇海铁路西进，企图夺取郑州再沿平汉路南犯武汉。由于国民党部队指挥紊乱、战机常失，终未实现围歼日军第十四师团的计划，于是日军从5月26日至30日连陷我虞城、商丘、宁陵、民权、睢县等，6月3日占领杞县、通许、陈留，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7日陷中牟，直犯郑州东白沙，中原重镇郑州岌岌可危。国民党军事当局为阻止日军西犯，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的洪水固然迟滞了日军攻占郑州再沿平汉路南下武汉的计划，但却淹没了豫东、皖北、苏北40余县的广大土地，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第三次是1938年9月至10月日军侵犯豫东南。8月下旬，敌

第二军开始自合肥西犯。9月2日攻陷豫皖边的叶家集后向我商城、固始、光山进攻，6日占领固始，16日商城沦陷，17日陷光山，18日潢川沦入敌手，21日敌攻占罗山，9月30日敌自南、北、东三面进犯信阳，10月12日日军占领信阳。至此，包括豫北、豫东、豫东南的河南半壁河山沦入敌手。

在日军进犯我豫北、豫东和豫东南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爱国将领和官兵，在人民的支持下，虽然也曾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英勇抵抗，但终未能遏止住敌人的疯狂进犯，拯救人民于水火。日军在军事进犯河南的过程中，杀戮我同胞，焚烧我家园，野蛮残忍至极。日军占领浚县当天，就枪杀刀劈无辜群众4500余人，强奸妇女500多人。据《安阳县志》记载，当时仅安阳县境内平汉铁路以西就有2341名群众惨遭杀害。日军陷濮阳不足一个月，就惨杀我同胞240多人，烧毁房屋14000多间。其中陈寨一村被用刀刺死者85人，枪杀43人，5户被杀绝，90%的房屋化为灰烬。日军占永城县城后，烧毁房屋3000余间，县城西十八里村一次就被集体枪杀284人。夏邑县韩镇集800多户人家中有500户的房屋被烧光，枪杀近200人，其中8户被杀绝。日军盘踞商城不到两个月，就烧毁城乡房屋10000余间。

日军的野蛮暴行，激起了河南广大人民的极大的民族义愤。英雄的河南各族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相反，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揭竿而起，和日军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殊死斗争。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重新组建，很快就成为全省各族人民抗战的领导中枢。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七·七”事变后，河南省工委书记刘子久，委员吴芝圃、沈东平分别在豫西、豫东和豫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9月12日中共河南省委创办了抗日救亡周刊《风雨》。此刊先后由王阑西、嵇文甫、姚雪垠和范文澜任主编，共出30期。省委领导人朱理治、刘子久、危拱

之等经常在该刊发表重要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发动和指导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全省各地纷纷出版。仅开封一地就相继出版了《大时代》旬刊、《抗日》周刊、《战时学生》、《争存》半月刊、《民族阵线》月刊、《经世》月刊以及《中原时报》、《抗日早报》等数十种。各式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如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会、抗日民众动员会、妇女救国会、学生抗日联合会、平津流亡同学会等在全省各地纷纷成立。特别是省委书记朱理治发表《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一文，号召青年学生成立乡村服务团到乡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日以后，各地抗日救亡团体更是风起云涌。如省会开封的“河南大学抗敌工作服务团”、“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睢县的“流动救亡话剧团”、项城的“海燕话剧团”、太康的“长白话剧团”、商丘的“先锋话剧团”、杞县的“抗日宣传队”等救亡团体组建后即奔赴全省各地，特别是广大乡村，发表抗日演说，演出抗日话剧，教唱抗日歌曲，举办训练班，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自卫队，搞得轰轰烈烈。当时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顺民》、《张家店》和《九·一八以来》等话剧，演唱的《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抗日民歌》、《流亡三部曲》和《大路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在广大群众中激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起到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

中共河南省委非常重视统战工作。1938年2月6日，省委在《风雨》周刊上公开发表《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向全省人民和国民党当局郑重声明：“我们热忱的愿意和国民党共同合作，为保卫河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省委除十分注意团结文化教育知识界的爱国人士外，还非常重视对河南省国民党当权人物的统战工作。省委组建后，即派妇女部长吴平积极领导和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她除以开封扶轮小学校长的身份积极做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河南大学教授王文田、开

封小学校长石青（刘峙的干女儿）等人的工作外，还派共产党员郭霖云积极做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及其夫人的工作。抗战初期，经过大量耐心的工作，先后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国民党的 5 个专员，3 个县党部，18 个县长及驻豫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另外，还与地方实力派别庭芳、王友梅建立了统战关系。这就为河南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建立抗日武装，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面对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确定了在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7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中原游击战争的准备也十分重视。1938 年初，中央为发动中原游击战争，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将军和数十名干部到河南，彭雪枫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4 月 21 日，毛泽东、刘少奇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平原地区广泛开展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1938 年 2 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详细讨论了河南党的工作，规定中共河南省委总的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在加紧开展党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来准备和发动河南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了“为创建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省各地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早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安阳沦陷前夕，豫北地方党组织先后在清丰古城建立了河北民军第四支队，六河沟煤矿建立了工人抗日游击支队。1938 年初，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同年 3 月开赴皖东敌后抗日，并在竹沟设立了留守处。我党利用留守处的合法地位，在竹沟开办了军政教导队和多种训练班，培训了 3000 余名党政干部，组织了 4000 余人的抗日武装，其中大部分奔赴豫皖

苏和豫鄂边敌后抗日。同时，我党还在豫南建立了信阳挺进队、泌阳抗日自卫军、光山农民抗日自卫团、商城抗敌挺进队、谭家河人民抗日自卫大队等抗日武装。1938年5月，豫东（西华）特委建立了约3000余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6月，在吴芝圃等同志领导下，睢县、杞县、太康一带建立了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到1938年秋，中共河南省委掌握的抗日武装已达3万余人。这些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为河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豫北、豫东和豫东南先后陷入敌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先后挺进河南敌后，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配合和领导当地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与兄弟省军民一起，在河南与邻省交界地区先后创建了晋冀豫、冀鲁豫、晋豫边、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河南党组织的状况，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党员、积极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任务。到1938年3月，全省党员增加20倍，达3000余人。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3月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发出“猛烈地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指示，并规定了“细心考察，大胆发展”的方针。中共河南省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提出要努力克服关门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要求大胆向工农阶级及劳苦大众开门。全省党组织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到1938年10月，全省党员已发展到8000余人，比一年前河南省委建立时增加了50倍。全省党员中，农民占48%，工人及雇工占3%，知识分子占40%，开明地主及上层进步分子占9%。在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省委还整顿、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1938年10月，全省已有9个特（工）委，1个市委，12个中心县委和一些县委、

区委、支部。黄河以南的 69 个县有 64 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抗战初期河南党组织的大发展，大大加强了党对河南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对坚持中原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

河南抗战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以 1939 年冬的“竹沟惨案”为起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的困难时期，尤其是 1941 年到 1943 年，困难更为严重。

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是和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河南在抗战全局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的。1938 年 10 月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国抗战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侵略者，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其侵华策略：在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对国民党当局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诱降国民党反共；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侵华兵力的 60%和伪军的全部，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地“扫荡”。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日本诱降、英美投降，加之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逐渐由抗战比较努力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抗日、降日之间摇摆不定。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其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并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增派部队到敌后，限制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接连不断地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河南成为敌、顽、我三方斗争的三角地区，是华北、华中沦陷区的近后方，南北伪政权的结合部；是国民党南北战场的结合部。同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结合部，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阻碍国民党顽军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进犯的屏障。河南这种特殊的战略位置，在

中原抗战中，就使得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长期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中。仅 1942 年 1 月至 10 月，敌伪军对冀鲁豫中心区千人以上“扫荡”就有 67 次之多，其中多次“扫荡”兵力在万人以上。1941 年 4 月日军对冀鲁豫根据地的一次大“扫荡”中，在方圆 50 里的中心区，屠杀民众 4000 余人，焚烧 142 个村庄的民房 5 万余间，80 个村庄全部变为焦土，炸毁水井百数十眼。1943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日军对太行四专区的辉县、淇县部分区乡“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淇县 30 个村抢粮食 868 石，牲口 251 头。在辉县九区的 18 个村，抢粮 2160 石，棉花 4594 斤，牲口 23 头，农具 1099 件。1941 年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越演越烈。“进剿”淮北的汤恩伯把属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豫东、皖北地区划分为三个清剿区，豫东的中牟、尉氏、杞县、太康、西华、睢县、淮阳、商丘、夏邑、永城等 21 个县划为第一、第二两个清剿区，从 2 月中旬开始，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五战区执行蒋介石的密令，出动 12 个师 10 万之众的兵力，在信（阳）罗（山）、鄂东等地区发动全面围剿。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大力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驻扎河南的原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相继率部 40000 多人投敌。部分顽军的伪化，更加重了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困难。自然灾害严重发展。1941 年至 1943 年，河南连续发生了旱、涝、蝗灾，受灾面积之大，灾情之重，实属历史上所罕见。1942 年全省“全年收成不及一二，民众饿死者 150 万人以上，逃亡在外者 300 万人以上”。1943 年灾情继续发展“南自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脉，西起荆紫关，东至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笼罩，大小麦颗粒未收，早秋全被旱死”，秋后又发生涝灾和蝗灾。蝗灾面积扩大到豫北、豫中、豫西 42 个县。蝗虫所过之处禾苗荡然无存。全省人口大量减少，1940 年为 30666255 人，到 1944 年

则减为 24710986 人，4 年减少近 600 万 其中一半是饥饿而死。战祸加天灾，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部队供给发生极大困难，许多地方的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

在重重艰难险阻面前，河南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没有被吓倒、被折服；相反，他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自卫原则，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拼搏，进行了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

（一）整顿和巩固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为了适应残酷斗争环境的需要，以利加强党的领导，从 1939 年 10 月开始，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指示，即对河南党组织进行全面整顿，主要措施是：加强各级干部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党的地方群众领袖；加强对党员的阶级教育、党的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坚定阶级立场，增强党性，反对妥协投降；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党的组织，清理各级组织中的不可靠分子；加强党与群众联系，把支部变成党在群众中的真正核心，依靠群众力量克服困难。经过半年多整顿，到 1940 年夏，党员由 1.6 万人（不含各边区根据地）减为 8805 人；党组织有 9 个地委，32 个县委，4 个县工委，130 个区委，610 个支部，进一步严密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1941 年 2 月下旬，为了应付更加险恶的形势，保存党的力量，使河南党组织免遭破坏，党中央果断决定河南党组织区以上干部全部撤退，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和省委统战部长王志杰负责。经过周密地准备，1942 年撤退干部分两批进行，经过一年零八个月卓有成效地工作，河南地下党 100 多名区以上的主要干部大部分撤退到延安，为党和人民保存了一支革命力量。从 1942 年开始，各根据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又先后

进行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党性修养。

1942年以后，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又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有效地克服了分散主义现象，改善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使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群众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等，在党委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使党真正成为领导核心。这就为党领导广大军民战胜困难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粉碎日伪军“扫荡”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将其军事进攻目标主要指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狡猾而凶残。

1940年6月至11月，日军对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连续进行四次大规模“扫荡”。是年6月5日，日军纠集开封、新乡之三十五师团和驻商丘之骑兵第四旅团共8000余人，汽车、坦克170辆，分三路向豫东北的濮阳地区进行“扫荡”。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三旅八团在滑县的小渠、黄村与敌人展开激战，毙伤敌军400余人，击毁敌汽车26辆。6月10日，敌又调集日伪军2万余人，分12路向濮阳、清丰合击。在杨得志司令员率领下，八路军二纵队新三旅、新二旅第四团和民军一旅等部，分散游击，及时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外线打击、袭扰敌人，迫使敌人于6月18日结束“扫荡”。

1940年3月16日，敌调集徐州、永城等地日伪军2000余人，汽车20辆，分5路“扫荡”我永城、宿县等根据地。彭雪枫将军号召所部指战员要“不惜死伤，不惜疲劳，以坚决、勇敢、迅速之动作，实行猛击”。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新四军第六支队一、三总队和地方武装，毫不畏惧，紧密配合，经过永城山城集、王白

楼、李石林、张大屯等地的英勇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3月31日，日军又调集日伪军3000余人，汽车39余辆，分4路合击永城北山城集地区，企图围歼第一总队。经过一总队拦截伏击，击毁汽车3辆，毙敌40余人，伤30余人，敌狼狈逃窜。据统计，半月内彭部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毙伤敌伪军1500余人，取得战利品甚多。为挽回败局，日军于4月1日又纠集日伪军3000余人，向山城集地区进行报复“扫荡”。一总队广大指战员在总队长鲁雨亭、政委孔石泉指挥下，奋勇杀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但总队长鲁雨亭却壮烈殉国。彭雪枫司令员在抗日民族英雄鲁雨亭的追悼会上致词，高度评价了他的英雄业绩，称“他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己，只知有国不知有家的真正的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的英雄”，是豫皖苏边区“登高一呼，万众敬从的群众领袖！”

1939年8月14日，日军第三师团一部400余人尾追进驻豫南朱堂店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团。15日拂晓敌人从西北方向开始进攻。二团一大队从侧翼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二大队从正面冲锋，日伪军仓皇逃窜。后来敌人仓皇西逃在芦家凹子遭我二团伏击，共毙伤敌80余人，是役大获全胜。二团队又乘胜袭击了信（阳）罗（山）公路上五里店日伪据点，打死皇协军团长杨立森，迫使伪军一个中队反正。1940年2月，李先念率豫鄂挺进纵队第二、三、五等三个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逼汉阳，在侏儒山歼灭伪军120余人，使武汉之敌为之震惊。

中原敌后广大军民以鲜血和生命粉碎日寇一次又一次“扫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同时，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均遭到重大损失，如冀鲁豫边截止到1940年11月底，共牺牲区级以上干部43人，被俘13人，共产党员由4月份的26284人减少到11205人；地方武装损失半数以上；党和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减少近3/4。

（三）广大军民奋起开展反顽斗争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反分裂、反倒退、反投降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河南国统区党组织领导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反顽斗争中，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使河南国统区的党组织避免了大的损失，为迎接以后的斗争保存了干部，积蓄了力量。

与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相配合，国民党顽固派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命令国民党少将参议耿明轩，纠集确山、泌阳、信阳三县常备队1800余人，进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和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省委书记刘子久和八团留守处主任王国华，指挥留守处的干部战士奋起反击，打退土顽多次进攻，于12日夜突出重围。顽军进占竹沟后，将留守机关、医院、印刷厂全部捣毁，财物抢掠一空，惨杀新四军伤病员、抗日军人家属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确山惨案”。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立即进行了公开地揭露、声讨和反击。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严正指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

自此以后，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即开展反顽斗争。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冀南和豫东北地区疯狂进行反共磨擦，大肆捕杀八路军指战员、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群众，暗中勾结日寇，反动气焰极其嚣张。据此，毛泽东于2月3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明确指出：对石友三部争取团结抗日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冀鲁豫等地区主力部队25个团，于2月9日至19日，在南宫、清河一带对石

友三部发起反击，毙伤俘顽军 7800 余人。石友三部遭沉重打击后，逃过漳河，退到冀鲁豫清丰东南一带。八路军讨伐大军乘其立足未稳，东渡卫河，连续作战，于 3 月 4 日，对清丰东南石友三部和观城、濮县一带石部的新八军发起反击，经 6 天激战，迫使顽军于 11 日逃至民权县以东陇海铁路的两侧地区。6 日至 8 日，八路军又调集冀鲁豫支队、挺进纵队赵谭支队，对在东明、菏泽县北部的石友三部发起攻击。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石友三部退往曹县、单县、定陶一带。5 月 15 日至 17 日，八路军又集中二纵队 7 个团，向东明集一带的石友三部展开全面攻击，攻克东明县城及顽军据点 10 余处，俘国民党东明县长吴致勤，建立了东明抗日民主政府。至此，第一次反顽军石友三作战结束，共歼石友三和丁树本部顽军 1.5 万余人，控制了北起朝城、南至东明、西起卫河、东至运河，包括清丰、南乐、濮县、濮阳、内黄、观城、朝城、范县、东明、鄄城 10 个县城的广大地区，使冀鲁豫和鲁西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另外，1940 年 2 月初，进行的“磁武涉林战役”也是豫北反顽斗争中较大的一次。1940 年 2 月 18 日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部围攻我军驻磁县贾壁的先遣支队一大队和驻武安县固义的青年纵队二团，伤亡我部 100 多人。事后，朱怀冰反诬我向进攻。刘伯承师长当即复电驳斥，并给予警告。但是，朱怀冰仍执迷不悟，在蒋介石命令下，率部向我军发动新的进攻。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指挥下，3 月初我军集中 13 个团 3 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向敌人发起反击。此役历时（3 月 5 日—8 日）4 天，歼顽军 10000 余人，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为表示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中共中央又派朱德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迫使国民党承认分区抗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完全被我军打退。

1941 年 1 月 6 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为打退此次反共高潮，1941

年春，豫皖苏边区军民英勇顽强地开展了三个月的反顽斗争。豫皖苏边区本来就一直处在日伪据点林立、顽军重兵压境之中。顽军自恃兵多势强，向我军步步进逼。顽九十二军、骑二军、骑八师等部共 40000 余人，兵分三路向我猛攻，于 2 月 10 日进占我江口集防地。之后，又接连进犯半壁店、罗集等地。顽军北渡涡河后，又策动日伪军对我边区进行疯狂“扫荡”。在斗争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新四军四师广大指战员和边区广大军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坚持豫皖苏区阵地、抵抗反共军进攻、不让其向津浦路东和陇海路北深入的指示，按照“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的斗争方针，进行了艰苦、顽强的反顽斗争。我新四军四师各部一面对日伪进行反“扫荡”，一面英勇抗击顽军的进攻，先后进行大大小小五十多次战斗，取得了檀城、马家楼、西门张庄、褚庄、大小郭家等战斗的胜利，给顽军以重大杀伤。在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虽然由于四师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损失也很严重，边区的党政军各机关和部队共伤亡、失踪达 4000 余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三个月反顽斗争暂时失利了，但是，边区广大军民，特别是四师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险恶的情况下，在穷凶极恶的敌人及顽军面前，所表现的那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永远值得继承、学习和发扬。

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反顽斗争的胜利，要把河南抗战坚持下去是不可想象的。

（四）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的政策和措施

面对 1941 年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一再提醒全党要“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中共提出了“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的总方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即著名的“十大政策”：加强对敌斗争、贯彻减租减息、普遍建立“三三制”政

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深入拥政爱民、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审查干部、坚持时事教育、大力发展生产。党中央强调指出：“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首先，大力推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

党的合理负担政策，是针对以往农村普遍存在负担不合理的状况而提出的。原来实行的不分好地坏地一律按地亩数摊派的办法，加上有的地主、恶霸利用权势隐瞒土地，致使不少地区的田赋捐税负担主要落在中贫农身上。林北县后峡村瞒报黑地 986.18 亩，竟占原负担地亩数的 155%。安阳县上庄村有户地主，实有地 39 亩，原只负担 23 亩，瞒报 16 亩，1/3 的负担转嫁给他人。这种不合理现象严重侵犯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困难。通过统一累进税制的实施和查黑地、反隐瞒、反假报斗争的开展，比较好地解决了负担不合理的状况。1943 年安阳全县查出瞒报黑地 2.18 万多亩，负担面积由原来的 4.7 万亩增加到 6.88 万亩，使负担更加合理，受到广大群众拍手称赞。减租减息政策是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双减”政策实行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农民从中得到了实际经济利益。据有关资料统计，林县、辉县、汲县的 302 个村，共有佃户 6598 户，租地 483497 亩，经过减租，租率由原来的 50—60%，降为 15—40%，租粮较原来减少 9833 石，实行减租后减为 112.1 石，较原来减少 38% 还强。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其次，大力开展生产救灾斗争。

1942 年后，河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按照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斗争。信

(阳)罗(山)边工委组织山北区人民,历时3个月,投工4.5万多个,建成从信阳彭家湾到辛店两华里多长的渡槽引水工程和天鹅堰坝,可灌溉农田近2000亩。信南县根据地委提出的“建设信应自给自足经济,把生产提到战前水平”的要求,积极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为根据地军民生活提供很大方便。太行区政府为领导群众战胜灾荒,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拨出235万元和20万斤小米,组织灾民开渠修坝,兴修水利;还拨出310万元贷款和81万斤粮食,支持灾区生产,安置灾民生活。安阳清流村组织全村636人参加运输煤炭合作社,以政府贷款的1000吨煤作基金,40天每人平均得运费1100元。1942年2月至4月,林北县组织近2000个纺织互助组,计8500多人,得工资米20万斤。豫北新区的第七、八专署建立后,一面努力领导生产,一面帮助群众救灾,新区的生产救灾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的大生产运动,是各抗日根据地生产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区党政军民各部门与群众同甘共苦,部队每人每天节粮2两,地方干部节粮4两,仅1942年度共节约126万多斤小米,全数救济灾民。1944年太行部队开荒88172亩,生产和节约粮食10万石以上。豫皖边部队和地方机关1943年一起开荒23570亩,生产和节约粮食10万石以上。豫皖边部队和地方机关1943年一起开荒23570亩,种菜6950亩。河南各抗日根据地,通过生产救灾和大生产运动,不仅恢复了生产、渡过了难关,而且还培养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密切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三,重视和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三三制”政权,是党在抗日根据地调节各抗日阶级的政治利益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从1940年开始,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并逐步完善。从1938年4月,河南建立第一个党领导的修武县抗日政权开始到1940年,太行的安阳、汤阴、林(县)

北；冀鲁豫的内黄、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滑县；豫皖苏的永城、夏邑；豫鄂边的信（阳）南等 40 多个县的抗日政权相继建立起来。许多县还建立了区、乡、村级政权。政府的机构设置也逐步完善。按照“三三制”建立起来的行署、专署、县、区各级政权和参议机构，既包含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又具有人民民主的内容，因而从政治上团结了各个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支援战争、粉碎敌伪顽的夹击和战胜困难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

河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渡过 1941 年至 1943 年的严重困难时期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从 1943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进入了再上升的阶段。

从 1944 年起，敌后军民对日军展开攻势作战，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开始局部反攻。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部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向豫北地区的敌伪军发起一系列凌厉攻势，收复大片国土，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

正当敌后军民展开局部攻势作战的时候，日军为击溃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占领平汉铁路南段及其沿线地区，确保武汉日军与华北日军的陆上交通，1944 年 4 月 18 日在其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调集 97000 余人，向河南正面战场发起进攻，河南战役爆发。从 4 月 18 日日军自中牟发动进攻起，到 5 月 25 日洛阳失守止，河南战役历时 37 天。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 20 多万人枪，豫中、豫西 38 座县城和 4 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沦为敌占区，广大敌占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河南战役前后，中共中央非常关注河南局势的变化，制定了“缩毂中原”的战略决策，多次研究和部署，数十次发出指示，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部署。